

• 专题研究 •

从宗周到成周： 孔子与司马迁的周史观

李 纪 祥

摘 要：司马迁的“周史观”乃是一种“周史变化观”，承自孔子而来，并无后世“周代分期观”的烙印；“东周”与“西周”于《周本纪》中另有所指。司马迁并未用“平王东迁”作为分期周史的概念与术语。通过《史记》之《三代世表》与《十二诸侯年表》，可以发现“周厉王”与“共和元年”方是司马迁视野中周史兴衰之关键。

关键词：周史变化观 周代分期观 平王东迁 周厉王 共和元年

近代以来，以中文撰写的历史教科书中都会述及所谓“西周”与“东周”的概念，这是一种时代的分期观。正如西汉与东汉以“光武中兴”作为朝代的分期界线，同时也是时间坐标，以此划分汉代为两个时期。也如同晋代之分为西晋与东晋，以“晋室南渡”作为划分时间的坐标；同时，西汉都于长安、东汉都于洛阳，西晋都于长安、东晋则都于金陵；若所谓“西周”者，则都于镐京，东周者则都于洛邑（雒邑）。可以看出，这些朝代皆有一个历史分期模式特色：第一，区分一朝代为二的称名，皆为西与东，“西”在该历史朝代前期，“东”则在历史朝代后期；第二，所以前、后与所以西、东，与该朝代京师国都坐落方位有关，故周称西、东，汉称西、东，唯晋则不称北、南，而仍以西、东称之，明显是用历史典故作为分期依据，与后来宋代在宋室南渡后，将宋高宗以来的时段称为“南宋”，而南渡以前时段称为“北宋”之称名法不同；第三，两个阶段的分期皆拥有各自的次名：如西/东周、西/东汉、西/东晋，此一次名皆隶属于一个朝代的共名之下：如周代、汉代、晋代。因此，我们可以称此种朝代共名下再区分为两个次名的历史观为“历史分期观”。周代作为共名之下的次名分期，其界限所在的时间坐标，则以“平王东迁”作为划分“西周”、“东周”的依据，这是一种“后司马迁时代”才出现的“周代分期观”。

近古以来许多学者在研究周代历史时，也都不免成了“接受史”中的案例，受此历史常识化影响，“接受”了该“周代分期观”，都采用以“周平王”作为“西周/东周”分界的模式。例如明清历史小说中的《东周列国志》，或是晚近以来的学者著作《西周史》、《西周编年》、《两周史论》等，反映的便是作为历史常识的“周代分期观”进入书名中的普及性与常态化。笔者以近代学者著作为例，目的并不是要指出其中有什么对错，相反地，近代以来研究“两周”著作的书名现象中必然蕴藏某种历史性，愈是成为常态现象的措词愈是如此；当潜藏的“两周”意识指向“周代分期观”下的“西周”与“东周”时，这样的“两周”措词决然与司马迁笔下的

“两周”措词不同。笔者举出此一专业领域中历史常识化的现象，乃是为了表明，即便是“历史常识”也有其“历史化”的形成过程；“历史化”的过程，或是“流传史”的脉络，又或者是“接受史”的角度，都是一种观史的态度；这意味着“历史常识”在其开始时本系“非历史常识”，其“形成过程”是一个历史学领域中可被探讨的对象。

虽然此种类型的历史分期观，在今日已是极为普及的历史常识认知，然而在司马迁之前，至少早到孔子之时，真的已经出现“西周”与“东周”的历史分期观吗？孔子歿时为鲁哀公十六年，时当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逾二年为鲁哀公十八年，周敬王崩。周敬王之前，史官或列国贵族及大夫等知识掌握者，是否已出现这样的认知与认知措词？孔子亦是一位知识掌握者，身处周平王东迁后的时代变局中，他是否将东迁于“王城”之前的周朝称之为“西周”，而将自我所处的时代称之为“东周”呢？《论语》中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的“东周”一词，是这样的语境吗？这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如果自周平王东迁以来，新的京师及新的王室已经开始有“周分为二”的“分期史观”，“二周”的用词与历史分期观点，于东迁伊始便已出现，那么在孔子言及“周史”的言论中，应当也会出现上述“周代分期观”之用词，一如今天我们已在使用的“西周”、“东周”二词？

下逮以继承孔子为己任的司马迁，其所作之《史记》，已然处在一个回眸遥望古代历史的汉代，那么本文不免要提出一个问题：以“踵《春秋》之后”为使命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无此种“周史分期观”的印迹？反映在《史记》中的周史观究竟如何？由于司马迁自述其宗旨为“踵《春秋》之后”，因而本文在考察司马迁周史观之前，理当对孔子的周史观作出描绘；同时藉此检视司马迁的周史观能否被视为“公羊家言”。尤其引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亲闻董生的书写以为依据，而忽略考察司马迁何以未予“董仲舒”一个“专传”的用意。因此，在《汉书》营造出汉初《公羊传》因董仲舒、胡毋生传衍“孔子《春秋》学”的时代氛围中，司马迁“一家之言”的语境究竟如何“踵《春秋》”呢？我们也可从《史记》的“周史观”开启一个考察的新视角。

本文所欲处理的问题有三个：第一，论述此一历史常态与普及用语的概念，乃是后来在历史中所形成的；第二，以《史记》文本为中心，考察司马迁笔下尚未出现以“平王东迁”为周代分界的“东/西周”用法；第三，司马迁对于周代历史亦有其史观，此一史观导源于孔子；司马迁以孔子视野所立足眺望者，在回顾周史兴衰后，制作出的文本便是本纪体裁的《周本纪》、表体的《三代世表》与《十二诸侯年表》；尤其是后者，笔者将证明这两个表是考察司马迁周史观的关键所在。

笔者亦将进一步阐明，孔子与司马迁的周史观乃是一种“周史变化观”，与后世形成的另一类型之“周代分期观”不同。前者有着世道运行的动态意含，后者则纯粹是以显著事件作为一种历史分期标志。孔子时尚无后世所称的“春秋时代”一词，因之孔子亦无使用“春秋”一词作为时间坐标以指涉当之可能。孔子言论中出现的“周史变化观”，并未给予一个明确的历史坐标，此一坐标乃系司马迁于《史记》中所标志；司马迁甚至将孔子言说周史变化观的时间坐标也标示出来，孔子言说的“现在”于是成为司马迁笔下的“历史”，司马迁的“现在”则在“踵《春秋》之后”的使命中，联系起司马迁对孔子“周史变化观”的继承。^①

① 以笔者所见，日本学者伊藤德男的《史记十表に見る司马迁の惓史観》是从表体方面讨论《史记》历史观的一部较好专著，特别是第1章研究《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之构成，第2章讨论《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之意义。该两章对共和元年以迄周室东迁的形势

一、《论语》中孔子的周史观

欲言司马迁的周史观，必得先明孔子的周史观；欲明孔子的周史观，则须先明孔子对其所处世势的当下感受。孔子的历史感不只涉及“过去”，抑且涉及“现在”，孔子的史观是一动态生成的史观，由过去至于现在可以知今、由现在可以逆溯而观古，“古今之变”便是孔子史观所成之史观；“礼”是内在脉络的主轴，“有道无道”是升降变化的指标；故《论语·八佾》载其言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依注家之解，“文献”一词是“文”与“献”各有所指，换言之，“文献”在此尚未成词。“文”、“献”各自所指的意义，汉儒郑玄的解释与宋儒朱熹的解释大为不同。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②前者指可透过“阅读”而得到“能言”的对象；后者则指可透过“口头探询”而得到“能言”的对象；两者皆指向“探询”的意含则一。依朱熹所注之义，认为在“夏礼”、“殷礼”那里原有的“空白”处，因“文、献”的“拥有”而能“征之”，亦即“空白”透过“文、献”而得以填补；夏礼与殷礼也遂“能言之”。朱熹注：“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③笔者这样的解读乃是依朱熹之注的解释，是故朱熹注“征”为“证也”。然而，若是回到汉儒的注解，则可能是一种更有主体性的景象，尤其是指向杞、宋两位国君的批评景象，便在汉儒注解“文、献”二字中出现，此盖与朱熹的解读，甚至近代以来在“文献”二字已成专词之后的解读，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在校永怀堂本与阮元校勘注疏本何晏《论语集解》中，上引文本的章句系分为二，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为上句；“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为下句。上句何晏引包咸之注以为解，下句则引郑玄之注以为解。何晏“集解”中对于“注文”介入后的本文章句，很显然已对《论语》所载中孔子所言作了句读与解释。我们认为，何晏的章句未必为古义，如果依其所呈现的章句为解，则古义遂没。笔者所持理由便在于何晏《论语集解》中所引述的包咸注与郑玄注，何晏引包咸注云：“包曰：……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④引郑玄注云：“郑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⑤明显地，“文、献”二字在此不仅并未成“词”，乃系独立的“文”、“献”单字；同时，对两字之义的解读，郑玄的解读也与朱熹不同。郑注的“文、献”，

① 分析极详，值得参考。（详见伊藤德男：《史记十表に見る司马迁の惓史観》，东京：株式会社平和出版社，1994年，第19—40、41—74页）唯就其文中不断出现的“西周”一词而论，其学术性格实与笔者不同。

②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3，阮元《十三经注疏》重刊宋本论语注疏附校勘记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27页。

③ 《论语集注》卷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3页。

④ 《论语集注》卷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3—64页。案：此处引朱注文，笔者断句与点校本不同，点校本将“文”、“献”二字连读成一专词，笔者则依朱注分释“文”、“献”之义，将二字断开不予连读。

⑤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3，第27页。又见郑玄注，何晏集解：《孝经·论语集解》卷3，校永怀堂本，台北：新兴书局，1980年，第16页。

⑥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3，第27页。又见郑玄注，何晏集解：《孝经·论语集解》卷3，第16页。

必须要联上句为读，“文、献”二字才能见其语义，而且此二字决不是指向“学问”的途径，而系指杞、宋二君的治国能力与成效。由于杞、宋二君在“文（章）”、“贤（才）”上的不足，使得杞、宋二国虽为夏、殷之后，却无法“成/证”孔子的“能言夏礼”；如果此二国的“文章”、“贤才”皆“足”，那么就能“成/证”夫子“吾能言之”的“夏礼”了。由郑注看，他以为孔子之意仍在讨论“夏礼”与“治国”之关系，而且此一有“文”有“献”的“夏礼”，孔子是“能言”的，显然孔子对杞、宋二国的“文、献”有一份失落感，遗存在孔子对弟子的言谈中。由是，笔者以为，依郑玄之注，“文”与“献”之上应当各有一个主格存在，郑玄注即以为此主格当为二君，二君无文章亦无贤才，则自然不能“成就”其所治之二国。是故这一段文本的解读应当上下两句联读，“文献不足故也”也应当联上句而不应断开。“文、献”与“杞、宋”、“足、征”的关系，应当由“杞宋二君”来综合此三者，从实践的彰显度来印证孔子所能言的“夏殷之礼”之多寡，而不在“文本”形态的“文献”中“证明”孔子所能“言之”者的正确与否。朱熹的读法，正是以“文章”与“贤者”为一具有自足性与对象性的客体而可待他人来探问者；郑玄所注的古义反倒比较接近孔子所言的真谛，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一份对杞、宋二国国君不能“足征”的失落感怀。

《论语·为政》又云：“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因于”与“损益”，皆见孔子对天下大势乃至世局的关切，是有其主轴的，这个主轴的中心脉络可以用“道”字指称之，并且将对“道”的关怀与用心置于历史脉络之中，来考察一个时代的历史形势之升降变化，笔者称孔子此种模式下的历史观为“周史变化观”。依上文所引，孔子关心的不止是追问自身所处的现在世界何以如此，并且也关怀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即“三代”；依孔子所言，欲观“现在”何以如此，必须从历史的升降变化来考察，始能言之；则欲观周代，亦不能仅仅是针对周代一朝来思考与观史；欲从周史的回顾考察今日现象的形成，则更须先观“夏、商损益”的历史脉络；此所以《论语》中载有孔门师弟关心此课题的对话记录之故。对于孔子如何感受其所居处的现在世，《论语·八佾》载：“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②“仪”是卫国之邑，“封人”系卫国职官名，时孔子与诸弟子在卫，故仪封人请见，既见后，出而谓孔门诸弟子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显然是将天下形势视为“天下无道”并且“久矣”的现在世，复又以现在之天下无道与孔子之所为联系起来评价孔子；卫大夫之评价当可旁证卫国舆论的若干氛围；要之，孔门弟子将此段“他者的正面评价”选入《论语》，则弟子们显然同意仪封人的推崇。

又，《论语·微子》篇中，记孔子、门人与当时隐者长沮、桀溺相遇之事：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怆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③

①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2，第19页。

②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18，第165页。

③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3，第31页。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正因孔子以现在之世为一“天下无道之世”，方有此反语。

可见，孔子对当下当世的现在感，持一个天下无道的观点，这个天下无道有所至为关切的具体现象。在具体现象中，便是“无道久矣”的形势观察，而所以无道久矣的观察，通过对历史上的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便形成一条观察的中心主轴。此一中心主轴的根源，在于周天子所在的周王室。以此出发，遂有势变之降的感叹，也才有相对于周天子而来的“诸侯”、“大夫”、“陪臣”之语词主体，将这些主体联系起来的并非一个盛世的发展史轴，反倒是一个衰世的无道运行；这一切变化从历史角度观之，全系因为持天下礼乐制度、征伐秩序的位所，已经在“周史变化”中，由天子下降到诸侯。《论语·季氏》载孔子之言：“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孔子之言所表出者，乃是一种“周室”在历史中随世运而益降的观点，可如下所示：

(I)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II) 天下无道：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 礼乐征伐自诸侯→礼乐征伐自大夫→陪臣执国命

对于这样的周史观，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变化观，亦即孔子的“周史三变观”。

上述“大夫”一词，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云：“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为家臣阳虎所囚。”^②是文中所谓“大夫”，即鲁国“季氏之属”。所谓“陪臣”，何晏《集解》引马融注：“马曰：陪，重也；谓家臣。阳虎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齐。”^③是“陪臣执国命”，于鲁国即指季氏之家臣“阳虎之属”。何晏《集解》于此所引据，无论是引孔安国或是马融之注，皆以鲁国为说，欲合于本文中孔子所言十世、五世、三世也；如是，则孔子之叹虽若有实事之于鲁国发生；然而，如此下注以解《论语》所载孔子之言，孔子所慨叹的“天下有道”至于“天下无道”之形势变化，便竟只成了一种地方性、区域史的“鲁史观”，而非以鲁地所感所受为存在基础，借着“志于道”、“拨乱反正”的“梦见周公”以大其视野，怀抱“吾其为东周乎”心志的周史观。《论语·宪问》：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④

何晏《集解》引马融注曰：“成子，齐大夫陈恒也。”^⑤朱熹《论语集注》则注云：“是时孔子致仕居鲁，沐浴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⑥则孔子亦关怀于齐国发生之事：陈成子以臣弑君，即是不义之征伐事，已自大夫出，尤有甚者，竟为弑君上之事。是故孔子斋沐而朝告于哀公，请其讨伐；此举视若迂事，然适足以见孔子所投射出的心境，决非囿限一地的“鲁史观”；同时，我们也可以察见体知，孔子为此事专门斋沐而朝，实是希望鲁哀公能有一表

①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16，第147页。

②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16，第147页。

③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16，第147页。

④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14，第127—128页。

⑤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14，第128页。

⑥ 《论语集注》卷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4页。

态，表态中即便无出兵动作亦当有一声明。孔子此意，其孔门弟子当知之，否则不必记录于《论语》中。

陪臣既是挟诸侯大夫的家臣，则孔子所言，“自大夫出”与“陪臣执国命”，便有意义上之差别，“自大夫出”尚可见诸侯国君之命为假，而“陪臣执国命”则全然已见“家凌驾国”之势无可返。要之，孔子所述之主轴，关键则仍在天下权力之源的周天子，有周天子之衰，方有诸侯之礼乐征伐；有各诸侯国君之衰，方有大夫之礼乐征伐；有大夫家臣之强横，方有“陪臣执国命”；孔子实以四个阶层性来表述此一世道之愈降性，此即：天子—诸侯—大夫—陪臣。《论语》中孔子之周史观，不仅是一“周史的变化观”，而且是迄今为止仍在其势运当中而体会于今、观看于前的周代历史之变化观。在此“周史变化观”中，可以明显看到势与道之陵夷升降的三变观；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孔子对“周史”所表述的“周史三变观”；文本来源所据则出于《论语·季氏》。孔子对鲁国之陪臣大夫执国命的现象，尤其有着大其视野的联系，于空间则联系到以“周室天子”为主的天下，于时间上亦大其上下视野于“周史”上的变化，甚至进而于观史言说中道出何以现在世界会如此；在孔子所述的“周史变化观”中，很显然地，系以“周天子”为主的历史变化主轴与中心，及此变化主轴之迄于今的观察与联系，乃是孔子深切感受于当下的核心所在；无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或“吾其为东周乎”等语言，皆环绕于此。《论语·八佾》记载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不满之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①“八佾”正是象征天子祭献时所用之舞秩，鲁国为诸侯，只能用六，唯因其祖周公之故，得特准于祭祀周公于太庙时，用天子之秩，以八为舞数；至于他公之宫的祭祀，则仍须比于诸侯之体制；对于鲁国何时开始僭用八秩，已不可考；可知者，为鲁国国君早已僭用八秩之礼久矣，是故遂有家臣季氏亦仿用八佾舞于庭之事，孔子对此事乃有“不可忍”之言。《左传》记载鲁隐公五年（前718）欲于仲子之宫献祭而询之以羽数，最后以诸侯当用六而得其数，故《春秋》经文书云：“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②《左传》则云：“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③杜预注云：“万，舞也。”^④杜预又以为鲁君早已僭用八佾行祭，非仅祭祀周公于太庙而已，于历代诸公之宫亦然，僭用八数久矣；故经文所书“初献六羽”之“初”义，乃指隐公为仲子亦即其弟桓公之母而设之羽数，仿诸侯而用六义；杜预并举季氏之僭用八事件作比较。杜预云：“鲁唯文王、周公庙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隐公特立此妇人之庙，详问众仲，因明大典。故传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后季氏舞八佾于庭，知唯在仲子之庙用六。”^⑤孔颖达《正义》疏云：

①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卷3，第25页。

② 杜预集解，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卷3，阮元《十三经注疏》重刊宋本左传注疏附校勘记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57页。

③ 杜预集解，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卷3，第61—62页。

④ 杜预集解，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卷3，第61页。案：此处杜预所注与《公羊传》及何休注义不同说，《公羊传》以为“万”与“羽”系不同之舞名，万为武舞、羽为文舞，妇人无须武舞，故经文只书“献羽”；而杜预直以舞注万，是以“万”为舞之大名。（详见孔颖达《春秋正义》所述）又，何休注文所云，则曰：“不言六佾者，言佾，则于舞在其中，明妇人无武事，独奏文乐。”（参见何休解诂：《春秋公羊传》卷3，校永怀堂本，台北：新兴书局，1982年，第16页）

⑤ 杜预集解，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卷3，第62页。

由文王、周公庙用八佾，他公之庙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隐公详问众仲，众仲因明大典，公从其言，于仲子之庙初献六羽。故传亦因言始用六佾。谓仲子之庙用六佾，他公则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时，鲁犹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传》称：昭公谓子家驹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是昭公之时，僭用八也。^①

《礼记·祭统》亦载：

昔者，周公旦有助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②

孔颖达疏所云是《公羊传》所载子家驹直言鲁昭公之僭，昭公之僭即是诸侯之僭；而《论语》所载则季氏之僭，季氏之僭即是大夫之僭也。

《公羊传》于《春秋》经文昭公二十五年秋九月“齐侯唁公于野井”下云：“唁公者何？昭公将弑季氏。告子家驹曰：季氏为无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③ 传文“昭公将弑季氏”，何休注：“传言弑者，从昭公之辞。”^④ 传文之“公室”，何休注：“诸侯称公室”，^⑤ 盖相对“王室”一词。徐彦疏：“解云：隐四年传云：‘与弑公。’何氏云：‘弑者，杀君之辞。’然则臣下犯于君、父，皆谓之弑。今昭公欲讨臣下而言弑，违于常义，故须解之。”^⑥ 是传文转录昭公所言欲“弑”季氏，而不曰“杀”，故注、疏皆于此有解。《公羊传》又续载鲁昭公与子家驹之对话，曰：

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且夫牛马维娄，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众久矣，君无多辱焉。”然则诸侯不立两观，周衰，诸侯僭而置之。是臣无有事君之礼也。天子之舞，始设朱干，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权丧失也。^⑦

从《公羊传》可知，不仅当时之形势已如子家驹所言，而且昭公自己恐怕亦以季氏违于常义之势为“常”，故不自觉以“弑季氏”为言辞，已忘自为“君”之位阶，当用“讨”、“杀”也，此正何休解诂之要义。而“子家驹”的言说，在《公羊传》传文中，则系以“引文叙事”的模式出现，其所言说的“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诸侯，久矣！”明白地反映出当时鲁国大臣的周史观点。而子家驹的时代在鲁昭公时，正与孔子同时，是故如果鲁国的子家驹与孔子的周史升降之变化观点是相近的，那么对于世道益降、王室愈衰的周代大势之观察，便不止于是孔子一人之言而已；至少我们在此已经看到鲁大夫子家驹、孔子、孔门诸弟子，以及后来的诸儒者流之观点中，皆具有“王室→诸侯→大夫”的“周史变化观”之模式。

① 杜预集解，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卷3，第62页。

②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卷49，阮元《十三经注疏》重刊宋本礼记注疏附校勘记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840页。郑注：“清庙，颂文王之诗也。”“康，犹褒大也。”（第840页）

③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卷24，阮元《十三经注疏》重刊宋本公羊注疏附校勘记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301—302页。

④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卷24，第301页。

⑤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卷24，第301页。

⑥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卷24，第302页。

⑦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卷24，第302页。

在《论语》中，唯一出现“东周”一词者，为《阳货》所记孔子之言：“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①盖《论语》所记原文本载孔子、子路师弟间对话，其本事则在“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②弗扰^③乃季氏宰，此时据费邑^④以畔，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质，孔子答云。何晏《论语集解》引汉孔安国之注，云：“不扰为季氏宰，与阳虎共执季桓子，而召孔子也。”^⑤是故子路有不悦之言，而孔子答云则有“东周”之语。何晏《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⑥皇侃疏则云：“鲁在东，周在西，云东周者，欲于鲁而兴周道；故云：吾其为东周也。一云：周室东迁洛邑，故曰东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择地而兴周道也。”^⑦何晏注“东周”无殊义，仅以孔子所在欲治之方位言，盖鲁相对于周而方位在东方也，故云“东周”；皇侃《义疏》所引三说，似以第一说义为长，类近公羊家“王鲁”之说。第二说以平王东迁洛邑故为东周，则其义最浅，盖用后起之周代分期观为说义，故也。

朱熹《论语集注》释此句则云：“岂徒哉，言必用我也。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⑧是朱熹亦解“东周”一词为“兴周道于东方”，其释“东周”之“东”，为方位词，盖实同于何晏之解。要之，笔者亦谓：缘由后世的“平王东迁观”形成以后，出现了以“周平王”作为时间坐标点来划分整个周代为二的“二周：西周/东周”观点，亦即是笔者在上文中所言之“周史分期观”；是以笔者必得面对《论语》中唯一出现的“东周”一词，虽然笔者在引述先儒之解释中，未能找到一个此词的确义，但至少可以证成孔子在用此词时，其意指绝非后世“周代分期观”模式的用法。

二、《史记》中的周史观

欲考究《史记》中的周史观，须从《史记》的“表”体书写入手。盖唯司马迁著《史记》制表体，始将孔子“周史变化观”之升降大势与兴衰所历，藉由“表见”（“表见”是司马迁自己的语言），由事以显，因年见序，使“周史变化观”不再只是感受与体会上的情境史观，而更是一具有编年坐标的序事与叙事。

司马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首先在文字部分表达了他对周代历史变化的观察：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

① 《论语集注》卷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7页。案：《论语义疏》作：“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复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多一“复”字。（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9，下册，台北：广文书局，1968年，第606页）

② 《论语集注》卷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6页。

③ 《论语集解义疏》作“公山不扰”。（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9，下册，第606页）《史记·孔子世家》作“公山不狃”。（《史记》卷47《孔子世家》，台北：宏业书局，1987年，第1914页）

④ 朱熹注曰：“费，季氏之私邑。”（《论语集注》卷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0页）

⑤ 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9，下册，第606页。

⑥ 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9，下册，第607页。

⑦ 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9，下册，第607页。

⑧ 《论语集注》卷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7页。

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①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之叙文中以“周厉王”作为关键词，故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何以厉王时是周代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司马迁在此叙文中续曰：“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政由五伯，诸侯恣行。”^②此文分明是类同于上述孔子的“王室衰”而后天下之政转移至于诸侯的周史变化观点，故曰“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文中的“是后……”，显然指“周厉王”以后，而不是本文前面所述今日之历史常识中的“平王东迁”以后。“是后”一词，表述的便是以“周厉王”作为周代历史升降盛衰的关键坐标。司马迁在他处，更多的是使用“幽、厉以后”作为一个周史盛衰变化升降的关键时刻之语言。

细察《十二诸侯年表》表体，会发现其顶首之格，系以周天子为主的编年，其下则依次为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等共13个诸侯；据三家注本《史记》中之《十二诸侯年表》，则司马迁之表制共有15横格，最上为年纪，盖“以年为表”也；其次为周；周以下则为诸侯：鲁为第一；自鲁迄吴，共13个诸侯。

《十二诸侯年表》的表制始自共和元年，^③终于孔子之卒；故《十二诸侯年表》叙云：“太史公曰：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旨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④司马迁制表欲以著见“盛衰大旨”，然而何者是他判断“盛衰”变化的依据？必有所据，方能依此解释其“大旨”？于是，首先是此表的起讫与始终，司马迁白云自共和为“始”，而“终”则在孔子；不仅在孔子，由此表的最后一条所纪之年，知此表实以“孔子卒”为“终”：顶格的周王之纪年，不过是见证与书写出孔子在那一年卒而已。司马迁何以如此重视“孔子卒”与“此表之终”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不仅因司马迁尊崇孔子，以为言六艺者必以孔子为宗；更因司马迁亦欲绍继孔子所述作之《春秋》。在《春秋》中，孔子笔下有著书“始”与书“终”之制义；《春秋》之“始”在“隐公元年”，“终”则在“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书写《春秋》何以在这“终”处绝笔而令其成就为“终”，则必然有其身为作述者之“作述意”，然而司马迁却系将《春秋》之“末条/西狩获麟”编年在孔子卒的前两年，亦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司马迁在制其表体时，显然在“终”处也绍继孔子之“终”，且以“孔子之终”为《十二诸侯年表》之“终”。但现在，笔者的疑问是：司马迁的以“孔子之终”为“司马迁制表之终”，究竟是哪一种“孔子之终”？是孔子的“书写之终”，还是孔子的“生命之终”？由《十二诸侯年表》看，司马迁选择的是后者，以孔子的“卒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为一个时代的表体之“终”。这不仅是司马迁个人的判断与书写定制，更是一个时代的传承史构思之问题，司马迁在制作此表时显然选择了《左传》，只有《左传》经文是记载至“孔子卒”这年为其“经文末条”的；《公羊》、《谷梁》的《春秋》经文都以鲁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作为孔子书写《春秋》的绝笔之末条处，与《左传》不

①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509页。

②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509页。

③ 司马迁称“共和元年”者，《竹书纪年》则载为“共伯和元年”，《史记》本文并未出现“共伯和”一词，虽然在后世的《史记》注解如三家注、研究专著如梁玉绳《史记志疑》等皆已道及，但仍系受到《竹书纪年》影响之故。本文不处理该问题，只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呈现者为准。

④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511页。

同。或者，我们应当调整一下视野，进一步思索“《春秋》与三《传》”与“《春秋》与司马迁”的传承差异；司马迁何以选择“孔子卒”以制表的行动展现在《史记》的编制书写中时，何以司马迁与《左传》作者的构想一样，皆以“孔子卒”作为一个时代的编年大事以及编年象征，《左传》作者将这个时间坐标放置在经学史上的《春秋》经位阶，而司马迁则置于他自己追随孔子《春秋》编年所制作而成的《十二诸侯年表》中；是否司马迁真的在“传”的位阶上追随了《左传》，还是司马迁在追随孔子与“继《春秋》”时，作出表象上同于《左传》而实则意义并不尽同的判断与选择？因此，从《太史公自序》父子对话所言出发，司马迁采择“孔子卒”的意义，便不是从汉初流行的“《春秋》学主流”之“公羊家”来追随，而是可以朝向司马迁如何直接面对“五百之统”来思考，司马迁并未将自己定位仅止于汉代前期经师、博士的某家文本学而已。

关于此表，尚值一提者为司马迁的文字、表体，两者在“终”处之“释文”与“表见”仍有不同：以文言，司马迁定“孔子卒”为“终之义”；以表言，则司马迁在“孔子卒”后，仍有纪年两竖格，分别为周敬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盖司马迁此表既系周为顶格以谱其“统”，则周敬王之“崩年”在孔子之“卒年”之后两年，故“终之实”当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崩”作为《十二诸侯年表》的末条、末格之表见。

司马迁作此表的真谛在于他认为周室已衰，继之维持诸夏天下之安定与秩序者在于诸侯，故《十二诸侯年表》叙文曰：“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①天下事件活动的主体，已然自“周厉王之后”或是“共和行政之后”移转至诸侯，此后的周史大势，便在这十二诸侯之间；但其所以能够称之为十二诸侯者，实缘于周天子的“周室”，所以年表的制作顶格为周天子诸王，便是表达了天下的“统”仍系在“周”，而天下的大事则已移转下降至诸侯而非周王室。但是，天下之大势何时开始由周天子之周室下降至于以诸侯为主呢？司马迁显然定夺了“周厉王”与“共和行政”之间的等同关系，在司马迁眼中，其所立足的周史兴亡盛衰观，唯“周厉王”时“京师乱”，方有“诸侯力政”的“共和行政”。因之，作为编年表述的表体，本表之“始”，便在“共和元年（前841）”。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更多“周史变化观”之基本语言在司马迁笔下出现，正是这些基本语言，组合出司马迁用以表述的“周史变化观”的基调：“周道缺”、“王室衰”、“诸侯僭天子”、“诸侯力政”、“诸侯恣行”、“政由五伯”、“大夫僭诸侯”等。

《史记》书写不仅是继承与仿效《春秋》，同时在《孔子世家》中也明言“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②《太史公自序》更借书写司马谈与司马迁的对话，托出所以绍继《春秋》之故。^③因之，《十二诸侯年表》的表体之始、表体之终，便有其书法上的意义可言。此表之始既在“共和元年”，所以“始”之故，则我们可以并司马迁于《史记》中置在此表之前的《三代世表》一起考察。《三代世表》中的“三代”一词是指夏、商、周，但为何以“夏商周”为主体的《三代世表》却以“共和元年”为此表之“终”呢？为何没有将整个周代放入以三代为主的《世表》中？笔者认为，这应当有两点考虑：其一，是《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壶遂所言《春秋》与《史记》的差异，在于司马迁有“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的考虑；^④而共和元年

①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509页。

② 《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1947页。

③ 参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5页。

④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9—3300页。

之前,实无纪年年号,是故从编年体制上来考虑,“世表”与“年表”的表体分期便在于共和元年;其二,是绍继《春秋》书法之义的书写,《三代世表》之“终”于“共和元年”与《十二诸侯年表》之“始”于“共和元年”,其实皆是一种书写意义的表达,这便是司马迁欲以“共和元年”作为一个里程碑标志的分界点;若是两个编世与编年的表相衔接,那么司马迁显然自《三代世表》的“黄帝为始”以迄《十二诸侯年表》的“孔子卒”,已经编制出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序列,而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司马迁独以“共和元年”之“两次出现”作为两个表体的衔接,其意为何?作为历史的分界者显然来自作者的制作与选择,司马迁已然在此传达出“共和元年”的独特讯息,这个在表体之形制、内涵上均有其意义的分界点,正是司马迁意欲借着此一表体之制作,传达出一个源自孔子书写《春秋》之义的讯息:“共和元年”是周代历史中一个重大变化之坐标点。如果将《三代世表》与《十二诸侯年表》合观,便会发现此“两表为一”的“周史系世与纪年”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的划分依据正是司马迁所以要将《三代世表》结束在“共和元年”、《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之故;《三代世表》之叙云: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①

既然《世表》结束处与《年表》开端处都是“共和元年”,那么这年便是司马迁将之视为可以象征天下大势发生变化的一年,“共和元年”足堪作为一个象征的符示,用以“表见”周代大势变化在这一年的前后发生。是何种变化大势在这一年前后发生?解读周代有变化大势发生的依据与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欲解读此处的司马迁之笔,必须由孔子的周史观入手,否则便不能掌握司马迁的述意、作意之讯息;孔子周史观中表达了对周王室衰微、号令自诸侯出的变化升降之慨叹,司马迁显然在表体制作中置入了孔子的、也是自己的周史观,笔者将之称为“周史变化观”。

但是,我们也不免要问,孔子没有使用而为司马迁所选择的编年坐标“共和元年”,究竟传达了什么天下大势的升降变化?笔者认为,“共和元年”其实与司马迁的另一语言息息相关,两表之所欲以表见者,即是此语言之以文字所传述者:此即是司马迁笔下常用的“幽、厉以来”。盖司马迁实以周之“厉王”为周代历史中大势升降变化、与夫王室衰微、政由方伯之关键。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前文已引见司马迁此观点的表述,而在《周本纪》中,司马迁亦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② 堪注意司马迁此文与《十二诸侯年表》序文述的相类同调。《周本纪》复载: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

① 此处引文笔者断句与点校本不同,点校本标作:“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史记》卷13《三代世表》,第488页)笔者以为,断“《尚书》集世”为句较佳,亦正与“五帝系谍”四字为读相应,“纪黄帝以来”则另起句。如是,全句应断为:“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五帝”一词,是否应著篇名,则未可知;或有其篇、或直称“五帝”、或即指史公之《五帝本纪》,盖此《纪》本系牒而作成,正与《世表》相应。

② 《史记》卷4《周本纪》,第149页。

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①造成的结果即是后来的厉王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14年，结束于还政厉王之子静即位为宣王时；共和元年正是司马迁用以制为《十二诸侯年表》之“始”的“首年”。《周本纪》又载周幽王时“太史伯阳甫”之言：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②引文中的“西周”无关乎本文主旨所欲处理者，仅是一方位表达之词，欲言“三川、岐山”在“周之西”而已；是故其下司马迁述引伯阳甫之言，仍用“周”之词而云：“周将亡矣”；裴骃《集解》与张守节《正义》皆以后来之“西/东周”二词用法观读此词，彼等皆以司马迁此处用“西周”一词，即是“周室”义；恐皆有误。^③

引文所述周幽王二年（前780）伯阳甫之言，显然在史官或司马迁笔下，其史事只有三川之竭与岐山之崩；尚不及于幽王三年以后发生的废太子、宠褒姒、犬戎祸诸事件；是故，司马迁在此处系用史述文字中的“预言叙事”的叙事模式，假著名的“太史”角色伯阳甫之口言说而出；不论此一预言叙事系司马迁之假笔亦或是当时之太史真能预见而卜。总之，汉代的司马迁以其职司亦为太史令，同时又以祖先能为周之太史而为其荣，则身处汉代的司马迁之书写，反映出的乃是“周幽王”作为一个关键的“周史之象征”已经出现，而且是与“周厉王”共同并称为“幽厉”，作为“周史盛衰观”的关键象征出现。《太史公自序》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④又述其父司马谈之言，记云：“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⑤《周本纪》之小序则云：“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⑥

“德盛西伯”、“实抚天下”，故周之开国皆以“文武”为并称；“由厉至幽”，则是“既丧酆镐”；而迄于赧王，则“洛邑不祀”；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序于《周本纪》者，共四字成词者八句，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其兴也，则序文、武，始兴于文王之德盛，抚有天下在武王功

① 《史记》卷4《周本纪》，第141页。

② 《史记》卷4《周本纪》，第145—146页。

③ 裴骃《史记集解》：“骃案、韦昭云：‘西周镐京地震动，故三川亦动。’”（《史记》卷4《周本纪》，第146页）案：裴骃此处引韦昭注《国语》之文，盖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多引采于《国语》之《周语》也。张守节《史记正义》：“此时以王城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史记》卷4《周本纪》，第146页）张守节所谓“此时”，不知何指？若指司马迁笔下三川动之时，则在幽王二年，尚无平王东迁于王城之事，何来以王城为东周。若指司马迁之时，则太史公实无此等周代分期观。揣张守节之意，当是以镐京时代，以周公、成王之后营有洛邑，而洛邑为东都，则镐京为西都；故称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也。若张氏果以此义解史公笔下之“西周”一词，则不免以后起之事与用词以称前史矣，张氏有误。故正文仍从史公之笔，“西周”为方位用词，专指京师之地的西方方位。

④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⑤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5页。

⑥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1—3302页。

成；其亡也，则序赧王之洛邑不祀；其序周之衰也，变化关键则在“由厉至幽”。是司马迁将整个《周本纪》之主轴放置在周史之兴亡观上，所谓见盛观衰与兴亡之迹者是也，而其变则在厉幽以来之势变。故《太史公自序》之《十二诸侯年表》小序云：“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①《六国年表》小序则云：“《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②《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之叙文云：“《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③而《史记·历书》云：“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襍祥废而不统。”同书《儒林列传》太史公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④

于是，“周厉王”与“共和元年”成为周代历史中由盛而衰的关键时刻与编年之坐标，周王室由盛而衰的转折即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将周幽王置于周厉王之前，称“幽厉之后”；将厉王置于幽王前，并称“厉幽之后”文字，唯一见而已，《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叙：“太史公曰：周封五等……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⑤依编年史序，当称“厉幽”，其所以称“厉幽”、“幽厉”意皆同。

因此，“幽厉以来”反映的是司马迁坐标于“厉王”的“古今之变”体察，则厉王之时，甚至是幽王之时，是否已形成“政由方伯”、“侯伯强国兴焉”的历史现象？“平王东迁”事件之后的“周朝形势”，一方面则是“王室衰微”，一方面则是“政由诸侯”，两者合言，确实是在平王东迁之后始出现的现象；但司马迁要考察的是已发生的现象，还是“古今变化兴衰”、“见盛观衰”的“兴亡消息”？“幽厉以来”的语言所反映的史观，对司马迁而言，确实是一个可以笼罩到平王东迁之后形势的语言，由此或者更可体会司马迁何以将周史形势变化的关键标志在厉王、坐标于共和之故。笔者认为，在《周本纪》中，司马迁特别载录厉王时“芮良夫（芮伯）”之言：“王室其将卑乎！”至幽王时则载录“周太史伯阳（甫）”两次发言，一则为惊恐之言，曰“周亡矣！”一则曰“祸成矣！”似乎更不可轻轻放过。“幽厉以来”的“幽王”时，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周亡于外夷”之大事件，这在周初开国便极重视“殷亡之鉴”的周史传统中，显然是一不可承载之“重”。在司马迁笔下，“幽王事件”的震动可能更超逾“东迁事件”，而“幽王事件”的肇端，司马迁已定在于厉王，否则“幽厉以来”在其笔下便不能成其词。

我们在《史记》本文的阅读中，尚注意到一特别的叙事笔法出现，在司马迁笔下，显然有意将“周衰以后”最重要的大事，聚焦于“孔子叙事”；由“周德之衰”到“孔子”的出现，两者从历史的脉络联系起来，便成为一个“周史叙事”的“叙事主轴”；司马迁立足汉代，其眼中的“周史视域”便系如此；将“周德之衰”与“孔子之出”作为前后两个重要的大事件，联系起两者的历史叙事之笔法，正是司马迁在“周史叙事”上的一个特别之处。司马迁以“周史兴

①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3页。

②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3页。

③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77页。

④ 《史记》卷26《历书》，第1258—1259页；《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第3115页。

⑤ 《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1页。

衰”作为周史上的大事件，同时以“孔子书写/言说周史兴衰”作为周史上的大事件，两者显然有着“以事为本”及“以人为本”的主体性之不同；这个不同，还可以更进一步来看：前者的“事”是在后者的“叙事”中成立的；后者的“叙事”，又被后来者即司马迁视为一重要的“事”，因之必须对其进行“叙事”；“叙事”与“事”之间所联系出来的历史主轴及其意义为何？如何掌握叙事文本及其所载之事？司马迁如何继承孔子？阅读者不妨自《史记》文本如何呈现孔子叙事之掌握入手，庶乎以察见一二。孔子的“周史叙事”与司马迁“如何叙孔子周史叙事”，孔子的周史观与司马迁的周史观，由孔子到司马迁、由司马迁观孔子，司马迁所自言的绍孔子、继《春秋》处，已成为阅读者考验司马迁是否成功的观览处。孔子的周史叙事主轴在周史观，司马迁于是将“幽厉”视为孔子周史观的“表见”，“孔子叙事”已在司马迁笔下成为史脉的叙事主轴：“事 \longleftrightarrow 孔子‘叙事’/‘事’ \longleftrightarrow 司马迁‘叙事’”。

如此，司马迁何以绍继孔子之意义便更为昭然。司马迁不仅将“孔子叙事”与“司马迁叙事”作为“周史叙事”上的两个重大事件，而且还藉由后者突显前者何以是周史兴衰升降变化的关键事件。《太史公自序》之《孔子世家》小序云：“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①可见作为一位在汉代意欲继承孔子之志、以及父亲司马谈之命的史家，司马迁观察到的周史观是与“孔子”及“孔子周史观”联系起来的，因而“孔子”与“孔子周史观”也成为一件“周代历史”中的“周史大事件”，甚至可以这样表述司马迁的周史观：正是因为幽厉之后的周道缺、礼乐衰、王室陵夷、诸侯力政、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才有孔子的仁以为己任，修《诗》、《书》、作《春秋》，以为天下之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但堪注意者，为司马迁对于孔子的“周史三变说”虽以继承之态度且将之作为一己周史观的立足点，但是司马迁却仅为“周史两变说”，仅在《史记》文本中强调“天子—诸侯—大夫”而已，在与《十二诸侯年表》相关文字论说中，绝未出现任何有关“陪臣执国命”的叙述史观，也未使用“陪臣”一词。司马迁使用“陪臣”一词，乃系出现在“孔后历史”的《六国年表》之时代中来使用其世道与世局之变化，一如前文已征引过的《太史公自序》之《六国年表》小序：“《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②司马迁将之放入“后孔子时代”的战国世局中作为一专词使用，“《春秋》之后”表述了司马迁对孔子的绍继，“陪臣秉政”与“强国相王”表述的是《六国年表》的形势，较诸《十二诸侯年表》之时，增加的便是“陪臣秉政”的世局。相较于《论语·八佾》所载孔子的语言描绘，显然“陪臣执国命”、“陪臣秉政”正是司马迁刻意的用词遣句之书写与叙笔。如此，则《十二诸侯年表》反映与书写的，便非孔子的“周史三变观”，而系“周史两变观”。

就时间次序言，必先有“周室既衰，诸侯恣行”的历史事件在先，而后方能有“仲尼悼”；“仲尼悼”然后始有“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的文本书写、文本传世之历史事件；因之“仲尼悼”一词，道出的乃是“书写的行动”，而不是“朝代的建构及其兴亡”；孔子的意义在于“观其大旨”与“书写王法”之文本立言，正与司马迁所为者相同。《陈涉世家》小序云：“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③司马迁从语言上将“汤、武作”与

①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10页。

②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3页。

③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10—3311页。

“《春秋》作”等同，以表达孔子书写文本作为一历史事件的位阶，这是前所未有的；《陈涉世家》小序所表述出的此一史观，系以为商汤、周武革命事件的历史意义，与孔子修《春秋》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的历史意义是等相比拟的。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在历史观，尤其是“周史变化观”上的一个殊胜之处。

总之，在司马迁笔下之表体与传体、纪体中，我们看到的是司马迁对《论语》“王室—诸侯—大夫”的继承，后世以“平王东迁观”作为划分西、东周二分观的“周代分期观”之模式语言，尚未出现。司马迁云：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①

司马迁不仅在《十二诸侯年表》之“始”处，以“共和元年”表见孔子的“周史变化观”；也在《十二诸侯年表》之“末”处，特别言说出来“始—末”便是“自共和迄孔子”，以见“孔子卒”足以作为一个时代的表体制作之“表见”之“终”。《六国年表》的时代已是“孔子卒后”的时代，司马迁却仍将自已定位于“踵继孔子”的历史书写之历史脉络上，彼所制作的《六国年表》，呈现的也还是以当初孔子言说的“周史第三变化：陪臣执国命/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为主轴，以“表见”其历史大势之兴衰要旨。

东汉之季的郑玄，在所制《诗谱》之序中，犹可见其以《十二诸侯年表》为据而形成的“观周”之视野，犹可证郑玄亦未以“平王东迁”作区分“西周/东周”的分期视野，其笺释《毛诗》的周室盛衰之背景，所据实在司马迁的“太史年表”。郑玄于《诗谱序》中，已详述诗之风雅颂声能观王化之迹，周代王化之迹的变化即是周代兴衰的变化，是故由诗可以观周史也。郑玄《诗谱序》云：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譖，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邾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犹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迄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②

可以看到，郑《序》其实是“以史说诗”的，他的周史观主轴就在“王化之迹”的兴衰之变，而兴衰之变正与诗之正经风雅颂及变风变雅相表里；郑所云之王化之迹便是孟子之“王者之迹熄”以及“诗亡而后《春秋》作”的语言；而郑所云“众国纷然”“五霸之末”，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等，又系司马迁之语言；而孰赏孰罚孰为纲纪，则更是孔子作《春秋》的天子之事了。要之，郑玄《诗谱序》中所反映出来的，正是源自孔子、孟子与司马迁的“周史变化观”。

郑玄《诗谱序》又云：“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

①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叙”，第511页。

② 郑玄：《诗谱序》，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重刊宋本毛诗注疏附校勘记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5—6页。

《春秋》次第；以立斯谱。”^①“太史年表”即《十二诸侯年表》；郑玄意谓平王以下可据《春秋》，夷、厉以上则岁数不明，自共和以迄平王甚至平王以下，皆须据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郑玄《诗谱序》续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企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②则《诗》中之“诗”，正提供了一个侧观周道王化历史之角度，从正风、正雅到变风、变雅；反之，郑云欲观《诗》之意，亦正可以由此而“循其上下而省之”，以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然而，如何能有“史文”作为参照？郑玄选择的，正是能“傍行而观之”的司马迁所制之诸表，尤其是《三代世表》与《十二诸侯年表》两表体，郑玄称之为“太史年表”。然则孔子所提供之“上下而省之”为何？司马迁由《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所提出的“自共和始”以迄“孔子卒”，已道出“周室—诸侯—大夫”的世势益降之观点。

三、结 论

孔子在《论语》中所言的“天下之无道”，不仅是一“当代感受”，抑且是一“久矣”的历史感受，由“所在”国度的“鲁史观”而更成其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周史观。《论语》所载“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便是孔子以天子为中心的“周史变化观”之言说。在此言说中，本文已析论其特色在于势、道陵夷升降的变化，并且是“周史三变观”的表述；文本来源所据则出于《论语·季氏》。本文并以为孔子的周史观系以“周天子”为核心，以此核心为历史主轴，则《春秋》经文所书写的“王室乱”之辞，便不止是孔子所亲闻的京师之事，而更是笔下所书写的《春秋》大事。

《汉书·诸侯王表》云：“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至赧阬岨河洛之间，分为二周……然天下谓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倾。历载八百余年，数极德尽，既于王赦，降为庶人，用天年终。”颜师古注：“谓东、西二周也。”^③谓班书所云“分为二周”即是所谓“东、西二周”，此义即是一种后世流传普及之“历史分期观”下之“西/东周”义，已见颜师古注《汉书》文中；然此犹是唐人之辞。细读班书《诸侯王表》叙文，“分为二周”之语确实已有“自此以后周即区别为二周”的语气在其中；然而，其语又承上“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而来，则当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之用法，言周势衰微，王道陵夷，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此其势变之大者，亦上承孔子所云之意，故后即接言“然天下谓之共主”。自“分为二周”之时间坐标点而言，班固一仍司马迁，亦不同于司马迁；班固将“分为二周”之时间坐标、“幽平之后，日以陵夷”的周史变化坐标，于《诸侯王表》叙文中置于“幽平之后”，此则班固大不同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厉王”为王道盛衰分界之用法。班固笔下虽尚未见专门以“平王东迁”作为“分为二周”之分期观，然“幽平”一词，确已见此历史分期观之端倪。班固“自幽平之后”，下文接以“日以陵夷”，此则分明仍是沿袭自孔子与司马迁之“周史变化观”中的“王室升降”之语言观，后世所谓“西周”与“东周”之词，尚未见班固使用；唯颜师古注言其本文“分为二周”为“西周”与“东周”，则班固自有承上与启下之语境。揆诸班固所述娄敬之言与班固所序自言，其实皆言“周衰”之大势变化也：周衰之前与周衰之后；以其势言，已分周为二，故曰

① 郑玄：《诗谱序》，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注疏》，第6页。

② 郑玄：《诗谱序》，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注疏》，第7页。

③ 《汉书》卷14《诸侯王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392页。

“及周之衰，分为二”；其所以“分为二”之义，则仍源于孔子，故曰“悯天子衰、诸侯起之”云云。颜师古注则颇令读者滋生混淆，《酈陆朱刘叔孙传》述蒯敬之言与《诸侯王表》叙文所云，两者叙事文皆出班固，然史事时间则一在西汉初、一在东汉初，颜师古两处注文则辞异旨异；注蒯敬文以实事为说，称二周为周景王崩后之周室裂分为二，故云东周君与西周君；注班固叙文则以形势为说，称“周分为二”为“幽平以后”所致之变化，故云其前为西周而其后为东周；颜注两义有别，故易生混。且周平王东迁以后，新的都城宗庙所在，当时系以“王城”称之；自此以下一直到周景王、周悼王、周敬王时，王室发生东迁“王城”以来首次的大分裂，此次分裂不仅导致王室乱局下的“二王并立”，也导致王室之都城由“王城”而迁移至“成周”。清儒陈立《公羊义疏》云：

盖周八百年，东西周之名凡三变：初言东西周者，以镐、洛对言，镐为西也。此而后言东西周，以王城、成周对言，王城为西也。战国后以河南、巩对言，河南为西也。《后汉郡国志》：河南，春秋时谓之王城；注引《博物记》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郑山；又引《地道记》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汉之洛阳县，周所谓成周也。^①是陈立之主轴欲以“东周/西周”为一“主语”以通上述所讨论之诸词之义，陈立实欲对此下总周八百年的“东周/西周”语言词义之变化做一历史总整理。其所云初起之称西、东周者，事涉周公之营东都雒邑，此雒邑既为方位上之相对于镐京而为之东周，又相对于宗庙所在之宗周而称为成周，此为陈立疏文所云之第一阶段之称名；第二阶段则起于周景王后之“王室乱”，王室乱起，京师王畿之地分裂为二，故自此时开始，“王城”始称“西周”；陈立以为周敬王城成周之前，“王城”即“东周”，城成周后，始称“成周”为“东周”。陈立所据以言平王所都“王城”称“东周”者，实出自郑玄之《毛诗笺》，陈立《公羊义疏》中即见征引郑《笺》之疏文；^②而亦见于唐张守节之《史记正义》。郑玄《毛诗笺》于《国风·王风·黍离》小序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③唐代陆德明云：“王国者，周室东都王城，畿内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阳是也。幽王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诗不能复雅，下列称风，以王当国，犹《春秋》称王人。”^④是陈立所据在此。又张守节《史记正义》于《周本纪》“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下注云：“此时以王城为东周，镐京为西周。”^⑤《周本纪》“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文下又注云：“即王城也。平王以前号东都，至敬王以后及战国为西周也。”^⑥

张守节《正义》所云，与郑玄《毛诗笺》、陈立《公羊义疏》之观点皆同，要点皆在于将“平王以前以洛邑为东周”转而至于以“平王以后所居之王城为东周”。张守节《正义》注“平王立，东迁于洛邑”，以司马迁所云之“洛邑”即“王城”，是也；又注云“平王以前号东都”、“敬王以后为西周”亦是；唯必欲言平王以前或周公所经营者，即为平王东迁所居之“王城”，是故平王以前亦可以称“王城”为“东周”，所谓“此时以王城为东周”者，则恐致误。

① 陈立：《公羊义疏》卷64，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第652页。

② 陈立：《公羊义疏》卷64，第652页引述。

③ 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注疏》卷4《王黍离诂训传第六》，第147页。

④ 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注疏》卷4《王黍离诂训传第六》标题下注引“陆曰”，第146页。

⑤ 《史记》卷4《周本纪》，第146页。

⑥ 《史记》卷4《周本纪》，第149页。

“西周/东周”作为一组对词称谓的出现，既有如此的历史变化，则唐时颜师古所注，若以“东/西周君”为说，则是战国之世的“二君并立”，与周景王崩后的“二王并立”说法大不相同，不唯“二君”与“二王”所指涉者不同，其所发生的时间坐标也不同。是故颜师古以其时间当在东周的“二君”来释班固《汉书》笔下“及周之衰，分为二”的文述时间，仍似有文义解读上的落差。笔者以为，班固此一用法的要紧处在于将周代形势升降的分界坐标，定在“幽平”而非司马迁的“幽厉”；盖此亦有可说：班固以“幽平”为连称，则显已认为时代变化分界即在此时，“幽王”系后世所谓“西周”之末王，而“平王”则为后世所谓的“东周”之始王，则称“幽平”、称“二周”，班固虽未明白使用“西周/东周”之措词，然一种以“平王东迁”作为整个“周史”之可区分为二的历史分期观，已酝酿在此。班固之说，以笔者所考见，亦有所承袭，今本何晏《论语集解》中，征引孔安国之说，即与其说相类。孔安国年代与司马迁同时而年辈为长，则汉武之时，对于孔子所言说的“周史变化观”，其王室衰而诸侯强的时间坐标，实不止司马迁一家，除“幽厉”说之外，尚有影响较微之“幽平”说，已然出现在孔安国注《论语》之文中。观何晏所征引孔安国之注文，可见孔氏亦是以幽王、平王为连说，尤其以“平王东迁”为“周始微弱”之时间坐标，明显与司马迁“周厉/共和”坐落点不同。是故班固之“幽平说”实肇端于此。孔氏虽用“平王东迁”一词，然其所表述之旨则仍在解《论语》，故所解仍为孔子之“周史变化观”；故其注文于此词之后，所接者为“周始微弱”。然则后世以“平王东迁”为词，以区分周代历史分二为“西/东周”者，其史观与分期观虽非始于孔安国，然其“平王东迁”观之语词使用，则系始见于孔安国注文，文本所据则在何晏《集解》所征引。又，此处孔安国解《论语》孔子言的模式，显然是据孔子《春秋》以解《论语》，故有“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始于隐公”之文；《春秋》本孔子据乱世而作，其文本十二公，首隐公；其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始”年，正以“隐公元年”为始年。是故笔者可以做此推断：后世“平王东迁”观的形成，其究始处，必当与读《春秋》有关。

据此，“周”之“平王”与“鲁”之“隐公”的“于时相接”，治《春秋》者皆当留意。今本《汉书》刘向本传中，已载刘向对于《春秋》首条之“隐公”与周王室“平王”两者“相接”之说；《汉书·楚元王传》刘向本传述刘向上封事疏中即言：“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①此条刘向所言仍为《公》、《谷》义下的解义为主。可注意者为“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句，已明显出现年代学上的对应，这正是后世西晋《左传》学家杜预所采用的“经传集解”之法，推测刘向若有此语，也有可能是因为其子刘歆发得《左传》“大好之”，父子“《春秋》颇难对话”下的语境影响。

由此看来，“左传家”之一杜预对《春秋》首条及始年所提出之“于时相接”的说法，以及此说法中对《论语》中孔子“吾其为东周乎”的解释，应是后世形成以“平王”为分期以区分周代为“二周：西/东周”分期观的关键。杜预系从周代的时间坐标入手，提出《春秋》始年的时间坐标必须对应于“周天子”的时间坐标。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云：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

^① 《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36页。

也；所称之为公，即鲁隐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①

上引文中，便是杜预所实行的“于时相接”之解经模式，既考虑到周代的历法问题，也考虑到“左传家”解经路数中何以“周王”必须作为意义的核心。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对于《春秋》经文首条的解释进路，在其历史时间坐标性上，亦是追随杜预的做法，采取历史时间坐标与经文时间坐标的相互对应性。从这点说，《太史公书》亦是一种生当孔子之后、继承孔子、“踵《春秋》之后”的“春秋学”领域之“诸家之一”；要之，司马迁决无将自己隶属于“公羊家”之语。从本文对《史记》周史观的分析可见，显然司马迁虽然亦是进一步对孔子的“周史变化观”给予历史时间的坐标点之坐落，但是并未将“平王东迁”的时间坐标视为“周史变化观”的变化点，其变化点在“幽厉”而不在“周平”。

有关《春秋》经文之首条书义，唯有《公羊传》采取“托喻周代之首王”的模式，以“鲁隐公”为“一朝受命之首王”，则此种对于解经所提问的“何始乎隐”下的响应与解经模式，便是以“周文王”作为其“王”义而对应于“所以始乎隐公”的回答，唯有“王鲁”、“始受命之王”等诸公羊家诸说，才能见证“孔子制一代法”、“《春秋》当新王”等公羊家之诸大义与微言。笔者并不认为《史记》属于“公羊家”的进路或模式，司马迁想要做到的乃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我们不妨以“第四家”或《汉书·艺文志》所提“三传五家”之外的“第六家”视之，否则无以解释他的“一家之言”为何义。

然而我们亦可察出一个讯息：“平王东迁观”这一“周代分期观”的“史观”之成形，当与《春秋》隐公经文之首条的大义与时间性有关，是由《春秋》之解经路数的“经观”而来，而且是产生在“于时相接也”思考模式与进路下，也就是《春秋左氏传》的解经路数下所形成与成形的；无论如何，用“平王东迁”以“分周”的观念之形成，确然是在解经者解《春秋》“首条”之“何以如此”的释经脉络中形成。

孔子作《春秋》，既为天子之事，则此经文文本之“始年/首条”，便必须给予其特别的“始书”之义，而鲁隐公元年作为《春秋》文本的始年首条，最容易联系起其意义的，便是当时的“周平王四十九年”；因之，关于“何以不是平王元年而是平王四十九年的隐公元年”作为《春秋》的“开端”？所谓“始”义，所谓“元”义，便系治《春秋》者必须面对的大端课题，三《传》在此解释亦有分歧。当然，我们更可以问：后世所谓“东周时代”，其分期始于何年？《春秋》何以以“隐公元年”为“始”，其所以为“始”，果真可以联系到“周平王”？“平王东迁”与“隐公元年”何者方是《春秋》“始年”的作义？前者为左传家义，后者则联系到周文王而为公羊家义，两家释读不同。对于上述问题，三《传》注家的解释对后世实有相当大的影响，杜预的说法恐怕更具影响力，他的“考诸其时则接”，显然意味着《春秋》首条鲁隐公元年之不具经义上的独立性，而必须要联系到周平王四十九年以成立平王东迁观与东周之始王来言说此首条之义。显然，就《春秋》经义而言，这乃是左传家的解义，范宁所注《春秋谷梁传》首条义，虽以“托始”解义，而实则已受杜预“历史编年”模式的影响，将“周道解纽”的时间坐标，追随了杜预模式而曰“于时则接乎隐公”。是故，经学上的解说作为观念而影响了史学上的历史坐标之编年，遂出现“周平王”与“鲁隐公”的“于时相接”，此种解经模式的意义，乃是在解经路数上已经出现了“历史编年的框架”，而此一框架的参考范本乃是来自于《史记》中的“整齐其故事”。

^① 杜预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台北：新兴书局，1981年，第40页。

《公羊传》所走的解经路数虽是另一种解经模式，然而其有关“三世”与“异辞书写”的文本时间区段，将“隐公”时的书写置入“所传闻世”中；则本文所得之一种推论，似乎亦有其参考价值：由《公羊传》所开出的公羊家之“三世异辞”解经路数，与孔子反映在《论语》中的“周史三变观”是否有关，由本文的解析看来，无论是周史三变观抑或周史两变观，都可以与《公羊传》的三异辞观相通其本。《公羊传》以《春秋》²⁴²年划分为三世以回顾历史，以事件发生的形势变化为据，从书写者的血缘成立“亲恩深浅”，区划形势升降为三世；抑或是向于未来的如何读出其所隐喻的三世、异辞隐喻着孔子的书法制义，以为后之览者制为天下仪法；皆可见其与孔子周史变化观之关系。有孔子之周史三变观，遂有公羊家“三世异辞”说之衍；有孔子道王室愈陵、势益降之大旨，遂有公羊家揭示“拨乱反正”与“世愈乱而道愈治”的微言以表大义。则《公羊传》与公羊家的三世观或异辞观，确实与《论语》中的周史变化观相通其本，源导于孔子。

总之，后世阅读者以《春秋》首条“鲁隐公”与“周平王”的联系为一“始”义的编年，以及“西周”、“东周”如何形成在“平王东迁”为“始”的上、下时间脉络中，成形为一种周代分期历史观的语境；此种周代分期观的语境下所使用的“西周”、“东周”之措词，显然已与“周景王/鲁昭公”时的“王室乱”所造成的周之分裂成为“西周”、“东周”之用词称法不同。后世若以“平王东迁”作为周代分期为“西周”、“东周”的分水岭，则显然已意味着周景王崩后的周室分裂，并未被后人视为周代历史上足以当起周代分期事件的标志；后世形成的历史观，乃是平王东迁作为一史观标志形成后的产物。笔者正文中所考察司马迁笔下的周史观，则不仅并无此种类型的“二周”观，平王东迁亦决然不是周史变化观中升降兴衰之关键，司马迁所见所录所关怀者，亦不在此。司马迁自我定位的“踵《春秋》之后”，呈现的乃是另一种历史世界的书写类型，既非周平王、亦非周景王，而系周厉王及其相续之共和元年。

〔作者李纪祥，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宜兰 26247〕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审：路育松）

CONTENTS

Research Articles

From Zongzhou to Chengzhou: Confucius and Sima Qian's View of Zhou Dynasty History

Li Jixiang(4)

Sima Qian sees Zhou history as “a history of changes,” a view inherited from Confucius. This view shows no trace of the later periodization of Zhou history; the “Eastern Zhou” and “Western Zhou” in the *Imperial Annals of the Zhou Dynasty* refer to something else. Sima Qian did not use King Ping's moving the capital eastward as a concept or term for the periodization of Zhou history. We can see from the *Genealogical Table of the Three Ages*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Twelve Vassals*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at in Sima Qian's eyes, “King Li of Zhou” and the “the first year of the Gonghe” were the key to the periodization of Zhou history.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acrifice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Tian Tian(24)

The late Western Han saw a movement to “restore ancient ways” and reform institutions.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acrifice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is trend. During the Emperors Yuan and Cheng reign periods, Kuang Heng took the initiative in proposing to reform the sacrifice by instituting the *jiao si* (郊祀) system.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Jianshi, the *nan jiao* (南郊) *jiao si* system was implemented. Advocates of this reform, represented by Kuang Heng, took “restoration of ancient ways” as their primary principle, but they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content of the ritual texts and so did not touch the core rituals of the original national sacrifice. Ove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he fortunes of the *nan jiao* sacrifice ebbed and flowed. Amid frequent radical changes in the supreme sacrifice, the earlier *ci zhi* (祠畤) sacrificial framework gradually fell into desuetude. Finally, Wang Mang put forward the “Yuan Shi Ceremonies”, taking the *Rites of Zhou* (周礼) as a guideline, and reshaped the *nan jiao* sacrifice system. This period saw the end of the *ci zhi*, operational since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an jiao jiao si* system, which was to last for 2000 years. This great change to the national sacrifice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transformed the character of the national sacrifice in traditional China.

A Review on the Prefectural and County-level Handling of Minor Civil Cas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law

Yu Jiang(40)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ystem of dispute adjudication by local elders in the mid-Ming, the number of minor civil lawsuits brought before prefectural and county-level governments soared.